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13位ISBN编号：9787807091677

10位ISBN编号：7807091673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作者：胡洪侠，张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内容概要

《私人阅读史1978-2008》中提到阅读在这30年中首先是以改变生活的面目出现，当财富和新的梦想向着每个普通人招手的时候，读书的首要目的就是寻找向新生活靠拢的最佳路径。

高考制度的确立更是为功利阅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学位论文、职称评定等等事关房子与票子的世俗考量，又无不改写着“读书无用”的老话，读书大到使国家振兴，小到使生活富足，这些可爱的目的性，恰恰是阅读改变生活的最初动力。

那些生于荒僻乡野的读书人，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穷苦书生，正是在书本的召唤和知识的阳光照耀下走向城市，走向耀眼的人生。

其实，讲读书改变人生，还有一层意思在于，通过读书，通过密密麻麻的语词的世界，国人的视野被最大限度地拓宽了。

讲世界是平的，讲世界变小了，大约就源于知识与信息以书刊的形式在全球的空前的流通。

通过阅读想象或体验那些遥远的世界，使平凡人生具有了无与伦比的丰富性。

30年间中国人知道的一切也许超过了以往的世世代代。

尤其是好奇心驱动下的阅读，使“知”与对“知”的谈论，获得休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愉悦与欣快。

功利阅读极大地改变了人生，而休闲阅读又极大地丰富了生活。

这是中国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推出的第一本回顾阅读历史的图书，也是第一本关于书的书。

该书收集了吴恩、李银河、沈冒文、周国平、吴晓波等34位国内一流的文化界专家的私人阅读史，回顾了30年中国出版的及在时代大背景下文化的变迁。

该书有较深刻的阅读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

书籍目录

阅读的阳光（代序）陈思和
陈思和书单
我的私人阅读史刘苏里
刘苏里书单
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年张冠生
张冠生书单
通过读书开始自我再启蒙王鲁湘
王鲁湘书单
阅读趋向个人化沈昌文
沈昌文书单
“要始终在夹缝里奋斗”李景端
李景端书单
为中国读者“打开一扇窗”李辉
李辉书单
书的价值不在是否畅销谢泳
谢泳书单
一时想不起哪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吴思
吴思书单
一场为了寻找世界观的阅读孟宪实
孟宪实书单
思潮逐次过思想沉下来陈子善
陈子善书单
打破读书“等级制”是最重要的变化止庵
止庵书单
把“我”和“我们”分开秋风
秋风书单
哈耶克是我的出发点扬之水
扬之水书单
为年开三部书许纪霖
许纪霖书单
年来的阅读不断分化陈平原
陈平原书单
怀想年前的“读书”贺卫方
贺卫方书单
在阅读中思考社会的走向梁文道
梁文道书单
在香港读内地的书范景中
范景中书单
我对书籍抱着感恩的态度江晓原
江晓原书单
我的年私人阅读史片段李银河
李银河书单
没能成为“守望者”，至少不是“螺丝钉”翟永明
翟永明书单
碰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周国平
周国平书单
我的写作来源于读书中的思考朱正琳
朱正琳书单
年来与很多书相见恨晚徐晓
徐晓书单
不再因为一本书而把自己颠覆毛尖
毛尖书单
从手抄本到电子书刘兵
刘兵书单
阅读：得益于经意与不经意间吴晓波
吴晓波书单
书单决定了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指向未来秦朔
秦朔书单
以阅读证明无知之无限徐敬亚
徐敬亚书单
读到最后，张开翅膀飞徐友渔
徐友渔书单
专业阅读与爱好阅读相结合曹意强
曹意强书单
在中西比较的阅读中走进艺术史殷双喜
殷双喜书单
让阅读回归传统与经典杨争光
杨争光书单
“两本中国书”和“一个中国人”编徐零墨

章节摘录

李辉 书的价值不在是否畅销 能够有一次回忆读书史的机会，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结合我的写作经历来看，有这么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

我最先想到的一本书是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开始是散见的，后来才读到合订本。

1979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大二，当时在学校图书馆的香港《大公报》复印件上陆续读到了《随想录》的连载，基本上在合订本出版之前，我就已读过这本书了。

应该说，我在上大学时就从事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随想录》属于畅销书 现在看来，《随想录》提出的许多命题在当时是比较敏感和超前的，比如文革博物馆、当代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及对说真话的呼吁等等，虽然书里有些观点从现在来看是过时了，但大部分内容还是值得继承和思考的。

我的一些写作基本上也是顺着这些思路来的，包括对文革的研究，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等等。

可以说，《随想录》是对我影响终身的一本书，它决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和思路。

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讲，说真话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趋于浮躁、扭曲的情况下，这些最简单的命题可能往往是最深刻的。

虽然有人批评巴金做的事情还不够，但当时他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做的事情仍然无人能超越。

2005年，作家出版社又重新出版《随想录》的时候，在少有宣传推广的情况下，依然发行了十几万册。

所以，这是一本长期的畅销书，很多人还是非常认可这本书的。

还有一本是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是我比较早了解近代史，尤其是了解近现代史之间如何过渡的一本书。

书中的一些见解对当时的我是非常有帮助的，它奠定了我的历史观，让我对近代思想有了一些了解，包括梁启超等思想家对后来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严复等思想的过渡，这些都是当时的历史课里没有介绍的。

在历史类书籍方面，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对我产生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在写作上，看书可以发现，如何通过人物来写历史。

其实，1978年出版的《光荣与梦想》之所以会引起阅读热潮，是因为当时全国都有一股“留学热”，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通过这本书来观照美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变化。

其实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放，了解一下以前人们攻击的“美帝国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对于当时人们扩大历史视野、扩大国际视野来看中国，起到了很大的左右。

《万历十五年》往往通过一个人物来串起一个大的历史面，这和传统的历史叙述是非常不一样的，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此外，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在个人写党史回忆录方面开了先风，后来薄一波等中共要员的回忆录相继出现。

李锐大部分通过当时的日记等史料来记录历史，书里少有议论和描述，都是“干货”，这对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建国以来的发展来讲，都是不可越过的一本书，具有长久的价值。

阅读对思考方式的影响 从社会经济层面上讲，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是较早让中国读者知道未来将如何发展的一本书。

当时中国社会处在“第二次浪潮”的过渡期，还未进入现代化，所以当时整个中国对外来文化充满了期待。

在那样的背景和氛围下，这本书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对社会的思想、文化、经济都产生了影响。

这里还要提一下“走向未来丛书”，包括《增长的极限》、《看不见的手》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这些都是过了20年、30年后来看，依然让人觉得是有生命力、有针对性的书。

近30年来，中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在过渡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西方社会其实已思考和讨论过了。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比如《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实际上是在讲环保、讲社会的和谐发展，1983年这本书出版后，也影响了一批作家写报告文学，开始通过写作来关注一些有关水资源等方面的问题。

从阅读对思考方式的影响上来讲，《剑桥中国史》是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多历史观点的一套书，相对于以前我们熟悉的历史研究，它完全是另外一种研究方式。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夏伊勒是记者出身，他靠档案来写历史。

在“文革”刚结束不久时读到这本书，会引发许多关于历史的思考，这种译著从现在来看依然影响非常深刻。

此外，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了“文革”大起大落的历史背景下，那是一个让人感到迷茫的年代，很多人对人的存在、对社会的存在都会重新思考，《存在与虚无》正好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思考方式。

现在看来，60后、70后就是在那个时候长大的，尤其是那些先锋派作家，就是读这类书长大的。

比如现在读余华等作家的小说，就会发现有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里面。

围绕着这样的阅读热潮，文学、绘画、话剧等文艺形式也形成了相应的潮流，说到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本书，它也有一种哲学的意味在里面，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很大。

在叙述方面，不少中青年作家都因这部小说而改变。

尤其是它的开头，非常多的人都在模仿。

过去人们用的是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开头方式，而当人们看到《百年孤独》的时候，就被这种叙述方式吸引住了。

其实，这种叙述方式就带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此外，包括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现代派小说的引进，对当时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学术“娱乐化”败坏阅读取向 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阅读现代派作品的评判很激烈，引申出来的争论有西方文化能不能进入中国？

西方现代派的小说、绘画、诗歌、话剧等艺术作品究竟该不该引进？

虽然后来这些问题都逐渐解决了，但在当时却让人如临大敌、谈虎色变。

应该说，现代派阅读不再成为禁区，这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来讲，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没有当时一批人的介绍和推动，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就没有那么积极的变化，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流行音乐、文艺电影等领域的发展，人们也不再认为这些是“颓废音乐”、“颓废电影”。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但最后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

当时主要是围绕着“二王”，即王朔和王蒙的一些讨论，尤其谈到了人文精神的建设。

讨论中一开始有谈到对历史怎么看，对红卫兵怎么看，后来的讨论却逐渐局限于对具体某一个作家的批判。

本来可以进一步深化，但由于各种原因却没有深化下去，没有对后来的阅读、教育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以后的争论热点往往围绕着一些畅销书。

畅销书好的一面是让很多草根的写作者可以发表自己丰富多彩的见解，也让很多人产生阅读的兴趣，例如《百家讲坛》的书就吸引很多人去读历史，其中就包括现在读民国史的热潮。

但这种阅读历史的方式很容易导致历史的“娱乐化”。

一些畅销书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败坏了阅读的取向。

因此，现在如何让历史从“娱乐化”向学术化、严肃化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如今网络的发展可以让人随意地发表一些看法，而不是在做过认真的研究之后才得出看法。

因此，有些从电视、网络等媒体产生的畅销书可能会钝化学术的研究和阅读的趣味，包括学术的娱乐化、讲座的娱乐化等等，这些都是令人担心的事情。

可能娱乐化是为了取悦读者、观众，以获取更多的点击率和收视率，但这种取悦方式很可能会改变以往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品位，使我们对历史、文学、思想、文化失去敬畏之心。

<<私人阅读史1978~2008>>

我认为，每本书的著述都应该尽量沉稳一点，这样，作者的看法才能够得起时间的考验，作者的观点、论述和考证在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依然能站得住，到时人们会说这个人不是在胡说八道。

这是最基本的标准，但又是很难达到的标准。

在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影响下，读者的阅读心态也历了一些变化。

当然，媒体本身也在产生变化，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因为收视率问题而停播，这是一种忽视长久价值的做法。

此外，一些报刊媒体也逐渐在削减文化副刊版面，转而增加娱乐版面，现在报纸的书评版、阅读版已越来越少了，像《深圳商报》、《新京报》等媒体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有历史沉淀意义的报道，这是很难得的。

因此，我认为评选“30年30本书”也应该以这样的历史标准为角度，去甄选、淘一些书，要考虑每本书的社会性、公益性和延续性等长久价值，而不是单单考虑它是否畅销。

吴思：一场为了寻找世界观的阅读 上大学之前，我们能读到的所有书，都是当时挑选出来的。

像托尔斯泰的，莱蒙托夫的，《斯巴达克思》已算出格了，甚至连《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文革”期间都属于修正主义，不让读了。

这些本来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格儿”所能容忍的作品。

实际上，我们上大学前读的所有书，都没有超过五六十年代划定的框框。

所有正宗的“资本主义”读物（即马克思列宁没有夸奖过的），中国古典的儒释道学说，基本都没读过。

这就是我们文科的知识背景。

上大学意味着，可以放开读书了 1978年上了大学之后，第一轮读书恰好就是冲开这个框框。

读什么书呢？

先读以前看不到的，例如传说中的“灰皮书”。

像德热à斯的《新阶级》，当年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内部参考资料，印给少数人看。

我不记得那本书是不是“灰皮”，那时也尚未解禁，但在学校阅览室可以读到。

因此上大学对我们那代人来说，就意味着——可以放开来读书了。

这一大类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条线索，不过向左右拓展了，我们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条主线之外的新学说。

上学不久，人大名教授吴大琨就推荐了《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谈的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作者是个意大利人，他详细介绍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框架。

以前我们熟悉的都是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现在看到了这个体系外的异端说法。

再往下走，就开始流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早年马克思主义著作。

青年马克思最热门的作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点谈“异化”理论。

人是怎么异化的，劳动是怎么异化的，这又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一个分析框架。

读起来非常吃力，但还是啃了一遍。

然后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更多学说，像法兰克福学派，读了一些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文章。

寻找“什么是对的” 第二大类是以前完全被封锁的所谓“资产阶级”学科，比如社会学和心理学。

我在插队的时候听说“心理学”这个词，觉得特别神往，当时想是不是有一门学科，学了之后就能洞悉人们的内心世界。

我曾拿了母亲的借书证，去首都图书馆借一本苏联人写的《心理学》，图书管理员不借，说是修正主义的书，还追问我的身份。

那是1976年前后，社会学、心理学都是资产阶级学科，要单位开证明，打着批判的旗号，才有可能借出来。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把社会学和心理学取消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学科的阶级性有问题。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1978年以后，我开始带着神秘感读这些书。

读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正是一本苏联人写的《普通心理学》。

很快，大学里又开始流传弗洛伊德、马斯洛等学派的心理学观点了。

此外就是社会学，建国以后中国几乎没有社会学的书。

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社会学??理》，还是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在上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教科书。

隔了一两年，中国开始引进苏联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和现时代》上下两本给我印象很好。

第三大类是对中国传统典籍的补课。

那时市面上还很难见到《论语》，我从图书馆借出一本，3?了一遍。

《庄子》也是借了几个版本对着读，还有《六祖坛??》等等，儒释道的基本功开始补了一点。

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我们的专业课，就不用说了。

大学期间的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扩展知识面，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还存在一个动力，即解决世界观崩溃的问题。

以前的社会实践，比如我们开门办学，上山下乡，整个生活??历好像都失败了。

那什么是对的？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列宁斯大林如果不对，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来追马克思，实际上是清理自己的疑问；读西方和中国古典，则是为了寻找“什么是对的”，是为了在过去的理论框架引起强烈怀疑之后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观。

感觉最好的是制度??济学 大学毕业以后，我进了《农民日报》，当了记者，之前的三条阅读线索还在延续：深究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西方学术继续浏览，中国古典继续补课。

在西方学术方面，“走向未来”丛书介绍了很多新学科新著作，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系统思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的综合》等等，都是以前从未接触的西方各种流派的简介。

紧接着，国内又出了好几套介绍西方学术流派的丛书，如“20世纪文库”、“西方学术文库”、“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作家参考丛书”，我买了很多来读。

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本书，有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健全的社会》，还有贵州人民出版社“现代社会与人”译丛，是心理学色彩较重的一套译丛，包括《反抗死亡》、《存在的勇气》、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症人格》等等。

这时，我的阅读又开辟了一个??济学的新系列。

以前对??济学毫无兴趣，觉得那是像帐房先生一样，一门很俗的学科。

可是当了记者，不读??济不行。

于是开始读农村??济学、发展??济学的基本知识。

最初还在社会主义??济学的基本框架内，但很快就转入西方??济学的框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走市场??济道路，??济学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显学，加上我1996年开始炒股，于是，??济学的阅读量越来越大。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市场??济学普及丛书，微观??济学，宏观??济学，计量??济学，都有简明的介绍。

。

??济学里让我感觉最好的是制度??济学。

最早我从盛洪那儿听说“制度??济学”这个词，最初读的是卢现祥写的一本小册子，后来德国人柯武刚的《制度??济学——??济秩序与公共政策》已广为流传了。

“制度??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济学中的结构与变迁》，也是这个学派的必读书。

微观??济学方面，比较流行的是斯蒂格利茨的《??济学》，后来是曼昆的《??济学??理》，最近我看的一本是《??济学的思维方式——??济学导论》。

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等一套三本书也很有新意。

??济学史方面，我读的是熊彼特的《??济分析史》三卷，对这个学科的历史形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私人阅读史1978~2008>>

新的世界观渐渐浮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阅读线索已??断了，之后，心理学、社会学的书也不读了。

当我试图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社会、解释我们看到的历史时，总是感觉其解释力不足，力量不够。

它们不能提供一种世界观，不能代替我们??过试错，已??被证伪、已??崩溃的世界观。

197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我粗略浏览了西方各种理论，再回过头补上中国古代??典。

做完这一切之后，还是不能形成一个对世界的、完整的、说服力很强的、有系统的看法。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放弃了这些努力，尽管还是不知道那个世界观在哪儿。

怎么办？

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我转向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学大秦运动为什么失败，比如从炒股票到理解公司和??济形势，再如朱元璋大力反腐败，为何还是垮台。

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出发，做具体的利害计算，又读了大量历史资料，这才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后来才有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

不想再靠在别人身上，借别人的框架去解释问题。

最近十几年，我的见解随着这些具体问题一寸一寸地生长，一寸一寸地建构，不理睬别的什么主义，只是去解决问题，从??济学、博弈论、生物学、生态学、行为学之中寻找启发。

直到前年，忽然意识到我有一种世界观了。

在我寻找它20多年未果、已??放弃寻找的情况下，这种新的世界观正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中，渐渐浮现出来。

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我的工作是在编《炎黄春秋》，当了十几年编??，也读了大量近现代史和当代史方面的东西。

它们不断加深我对中国历史的感觉，会发现，一个人生活在10年前、100年前或是500年前，往往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在相同环境下的行为非常一致，历史在不断重复。

1996年以后，我的阅读重点是中国历史。

以明史为核心，把重中之重放在明以来直至近现代的政治??济和战争史上。

同时也读些世界史，《罗马帝国衰亡史》、《封建社会》、《十五世纪的物质文明、??济和资本主义》、《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是印象深刻的好书。

五六年前，我又开始读生态学的书。

人类总是神圣化自己，从生物学和生态学角度去看人类社会结构，会有让人眼亮的收获。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必读书，还有《生态学》、《生态行为学》，更具体的，如《野生短尾猴的社会》、劳伦兹的《所罗门的指环——与鸟兽虫鱼的亲密对话》和《狗的家世》、《与狼共度》、《黑猩猩生活探秘》、《细胞生命的礼赞》、《蚂蚁帝国》等各个物种的书，都是我为了寻找启发而读的书。

人类学的书，也有几本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的解析》。

还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当作社会学来读。

《??村??济》则是正宗社会人类学的路数。

现在书桌上还摆着一本《地球上的人们》，也是这一类的。

除此以外，知识界流行的书也会涉及。

上大学时一度流行“美学”，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是个时髦。

还有些大名鼎鼎的小说，像《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日瓦戈医生》、《癌病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健三郎和博尔赫斯的书。

阿瑟?黑利的《航空港》、《钱商》、《汽车城》那一系列，都当作“闲书”看着玩儿。

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是种好消遣。

秋风 哈耶克是我的出发点 我1984年上大学。

那正是“新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反专制的呼声却是以反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所谓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书比较热门。

这方面的文章和学术活动都很多。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印象比较深的是“走向未来”丛书。

记得当时有一本《增长的极限》，最早介绍罗马俱乐部，又出了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反对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这场讨论，直到现在还留有深刻印象，因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始终是个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

还有一本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他们提出，从秦以来两千年中，中国社会不变，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当时自然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横扫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这本书是国内外较早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被称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中国历史之谜”。但真的解开了吗？

“80年代”缺乏真正的学术积累 我这一代人是在恢复高考以后上的中学。

我们一上大学，就接受到一大批新鲜思潮，像刘小枫、甘阳、刘小波、金观涛等一批文人、知识分子，已??开始做大量文化反思工作。

我们是看他们的书成长的。

和他们不同，我们不存在“冲开”什么的问题，那时大家试图解开的是“中国为什么会落后？”

“中国为什么会长期专制？”

”的疑惑。

我在大学学的是历史，自然更关心这些。

印象比较深的是陈鼓应先生的演讲，记得我和一个同学去北大，听他讲《老子》。

陈先生是比较早从台湾到内地来讲学的学者，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正好契合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比较研究”盛行的大趋势。

大学高年级的时候，还有几本书印象深刻，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后一本提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存在“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趋势。

这些书在整个知识界影响很大，不仅带来新的观点，还带来新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们完全突破了主流的学术话语体系。

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成长起来，对这个年代，我并不想作太高评价。

那是一个很浮躁的时代，比如，用“三论”来分析历史，从学术角度看，是比较荒唐的尝试。

又如，把传统文化和专制捆绑在一起批判，隔了20年来看，也很幼稚。

整个80年代，在我的印象中很“激荡”，不断有各种新的思潮和概念在流行，但真正的学术积累却没留下太多，也没有什么思想可言。

因为，人们的思考普遍缺乏足够的资源准备，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深度。

这样的“80年代遛??”走到极端便是《河殇》。

当代中国学术景象的两个源头 上世纪90年代以至于整个30年，学术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国文化重新进入内地中国人的视野。

最早，周作人、钱锺书、陈寅恪、张中行、季羨林等人开始流行，他们都是民国的“孤儿”和“遗腹子”，其学术思想都形成于民国时代。

他们的重新被发现，使得中国人在一定程度接上了自己的学术传统、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更多了。

这个阶段，民国传统文化的“复活”加之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引入，对整个中国后来的学术景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说今日中国还有一些学术，应该是从这两个源头发展而来，而不是上世纪80年代。

周作人的散文我差不多全读了。

岳麓书社的《知堂书话》大概最早，止庵编的周作人选本也读了，还有周作人的??译作品。

也读过钱锺书的小说、他的《宋诗选》。

至于《管锥编》，实话实说，还读了两遍。

陈寅恪的一些史学著作，他的《柳如是别传》也读过。

当然还有陆健东写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价值观震动，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个年代还有这样坚守自由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发掘了好几个人。

一个是陈寅恪先生的精神价值，当然也包括吴宓先生。

另一个是顾准的发现。

后者对中国思想界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很大。

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想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明晰起来。

陈寅恪对自由主义思想本身，并没有太多贡献，他的价值在于人格和精神；顾准却不同，他的思想对许多学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他主张??验主义的转向，这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有重大影响。

因而，此后的自由主义就和“五四”运动、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了，朱学勤后来所讲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应该就是这个自由主义。

这里涉及到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另一个源头，即哈耶克。

与之相伴，还有布坎南、波普尔思想的引入。

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布坎南关于宪政??济学的一些书，像《同意的计算》，都在那时被引进。

他们都是属于??验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内的成员，与顾准、陈寅恪等中国自有传统结合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股潮流，最终塑造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品质。

哈耶克席卷??济学、法学领域 哈耶克对中国的影响既在??济学领域，又在法学领域，包括政治学领域，他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学人。

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些想法，那主要是来自哈耶克。

哈耶克最早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冲击的一本书是《通往奴役之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内部发行本。

这本书对中国人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计划??济不可行？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济为什么会失败？

”等问题，给出了一个可信的答案。

他的著作还有几本比较重要，《个人主义与??济秩序》主要集中在??济学思想上，《自由秩序??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则体现了他的法学与政治学思想。

中国的法学体系是以苏联体系为基础的，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法学的介绍相对较少。

苏联法学体系所强调的和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致，就是国家本位。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哈耶克等英美法学体系被引进，整个社会的法律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人从理念上搞清楚了，民主究竟是什么，市场究竟是什么，以及法制究竟是怎么回事，最终落实到宪政究竟是什么。

人们开始放弃“法制”，而使用“法治”一词。

从这里开始，一个现代政府、一个现代社会的模样才逐渐清晰。

其实，不只是中国，在东欧的所有转型国家，哈耶克的影响都是最大的。

直到近几年，他的影响才开始衰减，因为在许多人看来，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已??不是打破专制，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边缘学派在中国的大热 对我来说，哈耶克是一个出发点，我不断重温哈耶克。

我最近一些年的阅读、研究，也正是沿着他的学术脉络，向上溯源。

由此找到了奥地利学派??济学和英国普通法传统。

近几年来，阅读了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法律著作和政治文献，形成了普通法宪政主义的一些初步观念。

至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作，则有门格斯的《国民??济学??理》。

我这两年主编了一套《奥地利学派??济学译丛》，新星出版社去年出了五本，今年又在浙??大学出版社出了两本。

“奥地利学派”在当代西方??济学体系中，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派，包括芝加哥学派，新制度学派的科斯、诺斯在内，都是比较边缘的。

但在中国，往往是边缘学派影响更大。

这不难理解。

这些学派更为关注制度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

国内??济学大家，如周其仁、张维?、吴敬琏等，关注的也都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宏观??济。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芝加哥学派??济学著作也被大量引入。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对整个??济学、对市场制度的建设影响都很大。

熊彼特的《??济发展理论》提出“企业家理论”，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企业家群体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民国学术传统再次复兴 最近出版界出现一个新现象，民国学术的复兴。

和上世纪90年代的民国人文复兴不同，这次偏重社会科学。

像陈衡哲的《西洋史》，萧公权、张君劢、钱端升先生的著作，都成批地出版。

虽然之前也陆续有不少民国学术著作被出版，但似乎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等领域。

刚去世的瞿同祖先生的《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倒是出版很早。

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也在上世纪90年代被大量出版了。

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文、哲学、历史研究的思路。

最近重新出版的则是民国时代的政治学、法学著作。

这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发展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

读了七八十年前学者的著作，你会发现，过去几十年的许多所谓“学术”几乎一无价值。

因为，我们迄今似乎还没有资格与萧先生、张先生、钱先生对话。

人们应该反省，中国当代学术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没有生产力。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传统曾??彻底断裂，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张君劢先生、萧公权先生写了多么伟大的著作。

这些著作重新出版是个好现象，我们终于可以衔接上一个伟大的学术思想传统，它有助于我们去思考中国学术思想的渊源。

这批民国学术思想大师们真正做到了中西知识传统的融合，他们向现代学人揭示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思路。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出版了。

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我迄今看到的最好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它既有高屋建瓴的视野，又有细致的文本分析。

历史方面有钱穆的《国史大纲》，我认为，迄今没有任何一部通史比这本书更值得推荐。

张君劢关于“宪政”、“新儒家”的著作也值得称道。

在我看来，他是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立国之道》，探讨现代中国立国之道，奇怪的是，我们的出版社却把其名字改成《政制与法制》。

张先生在关注宪政的同时，还投入很多精力研究儒家，试图实现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他一生建构了十分完整的学术体系，既是保守主义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宪政主义的，张君劢把三者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中国的“正统”。

如何接续这个正统，是当代学人所面临的挑战。

贺卫方 在阅读中思考社会的走向 对欧洲中世纪文化产生兴趣 要说30年来读过的那些

书，其实是不大容易谈的，因为杂七杂八的，看过很多。

回忆起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初是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世纪史》启发，作者的名字仿佛

是Sidney Painter，对于我这样一个上大学后才开始从ABC开始学英语的人来说，读这样的书真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虽然由于背景知识的匮乏，读得很慢，也很粗，不过，这样的书让我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一些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我还读了北大哲学所编的《西方哲学??著选读》，感觉很有趣味，我也很喜欢读。

另外，杨真的《基督教史纲》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当时关于基督教历史的书并不是特别多，国内学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者写的尤其少，那时我对基督教比较感兴趣，所以找来仔细读了一番。

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期间，很喜欢看美国学者汤普逊著的两卷本《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较早前就已出版，这部书非常仔细地描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王国之间的斗争。

同时，我也读一些文艺方面的书，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之前读大学时我读过钱锺书发表的一些论文，也读过《围城》，所以后来就想读一读他另外的一些著作。

记得当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四卷本的《管锥编》已出版，我很想全部买下来，但由于当时助学金有限，我只能一个月买一本，四个月才凑齐了。

当时那种对书特别渴望的感觉，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深受《光荣与梦想》文笔的影响 还有一本书在我求学期间让我特别喜欢，估计很多人在这次访谈中都会提到，就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这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分为四册，我一册一册地读了下来，觉得作者的文笔特别好，乐山等人译得很好。

应该说，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在现当代的历史，作者的笔调也让人觉得很新鲜，尤其是对人物的描述，以及对时代变化的反映。

作者的语言非常幽默风趣，后来我在写作上也追求一种幽默的风格，跟这本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的阅读一直继承了本科求学阶段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的兴趣，比如一些探求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法律之间关系的书，包括后来我主持译伯尔曼的作品《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也是受这种兴趣影响。

最近几年我比较关注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相关丛书，丁甦良的《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还有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等，前不久我还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黑船上的汉学家》，就是专门谈卫三畏的。

此外，在一些老学者的回忆录里，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是我看到的关于中国学术百年历史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在学术方面，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基础》在我们重新理解西方法律思想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种非常细致、具体的分析。

此外，《联邦党人文集》，以及托克维尔的两本重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这些书对我的观念形成也极其重要。

严复与胡适带来的启发 在法学领域，关于阅读的争论热点往往集中在对国家法律制度演变

的看法上。

改革开放30年，也是逐渐建设民主法制的过程。

民主法制如何建立，以及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很多争论都与这些方面有关联。

例如什么是人治？

什么是法治？

在刑事法律之中如何去解决“罪”与“非罪”之间的关系？

国家的权利要如何去限制？

国家的宪政体制现状如何等等。

我个人更偏向于在更深的层面去思考：我们的国家从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历史，如何过渡到宪政的、保障个人自由的历史。

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特别值得阅读的书是《严复集》。

我觉得严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直在思考中国跟英国这样的国家之间，文明的差异究竟是什么。

现在的译者很少在译之间穿插自己的东西，但严复在译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加入一些自己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和思考，包括传统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利、结构等等。

我在读严复的一些按语时，收获了非常多纯粹的观念，并不断地理解他的思考和观念。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对胡适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在他曾做过校长的学校里当教师，特别重要的是因为胡适对中国社会有一种独特的认识理解，对现代中国如何过渡到自由民主的社会有许多思考。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我大致上把胡适的作品都读过了，觉得他是一个能够深刻理解我们这个社会逻辑的学者，同时，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以及如何避免走一些弯路，他给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关注。

余英时曾说，其实胡适在学术上从今天看来已有点过时，甚至有些缺陷和错误，但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观念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的。

关于胡适的书，现在已出版了许多。

余英时对胡适思想历程的论述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相关作品中最有深度的。

此外还有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还有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及唐德刚系列，我认为这些书在今天都很值得我们去读。

那些对阅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对于我来说，读书一直有“开卷有益”的意义。

1979年，《读书》杂志提出“读书无禁区”。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读书》，它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领时代风潮的一个刊物，既引导着大家去读书，又启发大家去思考一些很深层的问题；既有社会科学的深度，又有人文精神的传播。

在我看来，当时这本杂志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精神的家园。

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读书也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风潮影响，比如说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

这套书带我去关注近代中国那些出使西方的人，指导我如何去观察西方、理解西方、阅读西方。

我非常喜欢，读得很认真，后来也一本本买齐了，这个过程也非常不容易。

在上世纪80年代，钟叔河先生在出版界应该是一个旗帜，一个符号。

另外还有一些“丛书”的编者总是默默地为我们带来一套套具有深刻意义的书。

我们在回顾个人阅读史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曾为我们的阅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从专业上看，应该说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法律书籍的出版不是特别景气。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法律著作的译就变得非常活跃。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亲身参与，并鼓励学生们去读这些书。

做我们这一行，读书就是职业的一部分，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读这些书，而是如果不读这些书，就没有办法教好自己的学生。

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既包括正襟危坐地读一些专业的书，也包括闲闲散散地读一些轻松的书。

总而言之，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时代，每次到书店里都可以看到许多非常让人喜欢的书，很多出版社不论大小，都坚持在出版一些非常好的书。

作为一个读者来讲，这些都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孟宪实 思潮逐次过思想沉下来 其实我真正开始有觉悟地读书，那是到了上大学的时候。

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当时一方面读了老师列出的专业书目，另一方面也受到一些思潮的影响，读了不少不是本专业的书，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反思”的书。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社会上很多“文革”习惯还保留着。

现在看那个时候，就像那时看“文革”，“今之视古，如后之视今”。

回顾过去这30年，其实整个社会是处在渐变的过程中，并不是从1978年一夜之间变成了2008年，这期间是比较缓慢地在发生变化。

应该说，其中思想界的变化比较剧烈，从而带动经济、社会的变化。

从读书这个角度讲，“‘文革’之后如何看待‘文革’”是当时“反思”的书里最主要的课题。

在党中央没有做出决议的时候，学术界和社会已各有各的看法，对“文革”的批评声浪很大，直到后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为这些讨论“定了个调”，但这些讨论仍在继续。

《斯大林时代》让人触目惊心 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认为“开放过头”了，要“收一收”。

当时的人对于改革开放是否能进行下去，并不是都看得很清楚。

不像现在，大家都觉得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应该说，“文革”之后社会上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认识到“文革”对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对于接下来要如何前进，当时社会上基本是支持改革开放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书就伴随着“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问题出现了，我记得当时有一本书叫《斯大林时代》，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肃反运动等等，当时这种悲剧性的历史让人感觉触目惊心。

不久后，国际上发生了两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一是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解散，当时我认为，柬埔寨共产党也属于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而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都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和先进的未来，那么柬埔寨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解散呢？

二是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那是一种工人运动，与当时执政的共产党合法斗争，这让我又面对了另外一个问题：本来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代表着工人的利益，可是在波兰却出现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政府对峙的局面。

后来这些问题伴随着我一边读书，一边面对一些现实问题。

应该说，通过一系列的阅读之后，我看待历史和现实开始有了一种深刻、严肃的态度。

美学和心理学重新流行起来 在我从小求学受到的教育中，对于我们中国自身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否定的。

“五四”以来的基调，都认为传统文化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中国的前进与抛弃这个包袱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抛弃越多，进步就越快。

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觉得这其实并不那么“可恨”，比如唐诗、宋词，真的会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吗？

这些通过阅读而获得的小小体验，就会转化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很有名，这本书没有用以前一贯的做法，把中国传统文化一笔否定，而是为每个时代的艺术都做一段很美妙的描述，比如青瓷、传统文学等，都有美的问题，其中也确实有中国的审美情趣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独特的部分，这是无可否认的。

所以当时这本书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在图书馆要预定、排队，才能借阅，许多人也纷纷去购买。

在那段时间里，美学似乎成了一个新生事物，每个人都希望能了解一点、说一点。

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弗洛伊德作品重新进入中国，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美学和心理学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在中国流行过，但后来中断了，美学受到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美学，而心理学也被认为是不科学的。

直到改革开放才重新出现并流行起来，包括叔本华、尼采等等也是这样重新讲起来的。

当时要是到大学去做一个有关弗洛伊德的讲座，听众一定会爆满。

现在回忆起来，弗洛伊德系统讲心理学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书涉及到怎么看个人心理，其实心理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是可以研究、把握和分析的。

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三论”挺有影响力 在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史学界有一个口号叫“史学危机”，认为我们一直坚持的史学理念有问题，史学范式出现毛病，出现危机了，大家就各想各的办法。

当时打开国门后，各种新的理论纷纷传进来，其中金观涛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所谓的“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用外来的方法来直接研究中国历史，他们在一本叫《兴盛与危机》的书里讲，中国古代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几个系统之间如何进行互动，从而形成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当时我则觉得心理学非常有用，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古代的历史人物，但是心理学无法分析一切，比如社会结构就无法用心理学来分析。

同样的，用系统论来分析历史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有时前面分析准了，后面就不准。

当时我通过使劲读这些书认识到，越是整齐划一，看起来很严谨、很系统的理论，运用起来就越有问题，越会出现破绽。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李泽厚又出了几本书，就是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

李泽厚的特点是没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但有一些非常核心的观点，比如他分析古代的思想家，会综合出一些说法，如“实践理性”等等。

不管你同不同意，但是他的分析有点道理。

所以他的观点比系统论那些更有说服力。

他谈到现代思想史的时候，有个观点非常出名，就是救亡与启蒙的关系问题。

中国要前进，一方面要救亡，另一方面要启蒙，救亡是反帝，启蒙是反封建。

这两个主题本来是近代的基本问题，但又是相互冲突的，后来的结局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李泽厚认为，现在救亡问题已解决了，关键是要启蒙。

这种思想是很有震撼性的，它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成果，却提出了现实性的问题。

所以，在当时的“文化热”中，李泽厚、庞朴等人的著作都挺有影响力的。

从1985年到1986年，有那么一段时间几乎整个学界、媒体都在谈文化，其实这就是有关文化问题谈论的热潮。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里，可以说实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过渡，就是从以开始反思“文革”，提出“中国向何处去”，到后来“文化热”的时候，大家认定方向找到了，所以当时的思潮非常多。

陈寅恪和顾准的思想启蒙意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认识到社会还是需要发展经济，大家不再急于求成了，认为中国还是需要点滴建设，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掉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社会结构问题等等。

很多人也认识到，“五四”之后的进步青年往往都比较着急，总是试图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建设问题，其实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

在这以后，应该说中国社会真正成熟了，知识界讨论问题也不再那么急躁了。

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分野，大家各做各的专业，“下海”也成为一种潮流。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再复和李泽厚一起在国外发表了一篇谈话叫《告别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知识界、读书界的思考。

李泽厚总结了一句话，大意是思想沉下去，学术提上来，用学术代替思想。

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重新重视经济建设。

这个时候读书界最大的变化是陈寅恪被重新提出来，当时最重要的一本书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透露了一些建国之初的事情，非常让人震动。

当时共产党政权刚刚建立，需要搞统战工作，鉴于陈寅恪在历史学界的名气很大，想请他当历史研究所的所长。

但陈寅恪提出了一个条件，他希望史学研究要有思想自由的保障，不能抹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以他的条件就是历史所不能搞政治学习，还要求领导人给他在保证书上签字押。

可想而知，最后他没有当成这个所长。

陈寅恪是一介书生，竟然敢于向当时的领导人提出这样一个显然不会被答应的条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他的胆识令很多人钦佩，而且人们发现他的学问还真大，他不仅通晓多种外语，还对许多历史问题、文化问题有深刻的见解。

他绝对是一个书斋式的严肃学者，但对整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也非常关心，这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来。

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读陈寅恪也成为了一种潮流，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治学态度也影响了许多学者。

这背后也反映出了许多问题，比如说在做学问上，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把想法付诸于实践，而应该像陈寅恪一样，慢慢地沉淀下来，厚积而薄发。

另外，陈寅恪也是有感情的，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同样可以体现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应该说，陈寅恪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从他的著述里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的许多观点、想法也都是站在文化本位的角度和立场来展开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文化要发展，也要保留，他主张珍惜中国文化。

陈寅恪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历史，用自己的行为为中国做了一个注释，让大家不再随意否定传统文化了。

在陈寅恪重新受到关注的同时，顾准对很多人的影响也很大。

<<私人阅读史1978 ~ 2008>>

《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是当时很流行的两本书。

顾准思考的是全世界的问题，他从古希腊民主政治角度去思考，得出中国也要实现民主的结论。

这是他在文革那种状态下写的东西，一个人在最黑暗的时候，思考着国家最光辉的问题。

而且他个人受了很多的苦，他的孩子都跟他决裂了，但他仍然为国家做很多思考。

所以，顾准也被喻为“黑暗时唯一在思考的人”。

当代中国有没有思想家呢？

如果有的话就是顾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